



幸福與靈魂體的追尋

與戰地記者張炳玲的對談

成大中文系／翁文嫻

時間
2015.7.13

地點
成大圖書館 B1 藝廊

張炳玲簡介 |

張炳玲，香港著名戰地記者，2003-2006年香港記者協會主席。為八九民運坦克車照片的拍攝見證人。新聞著作《採訪現場》(2000)、《人物現場》(2001)；詩集《綠比藍更白》(2011)、天安門攝影傳記《我要回家》(2009)；主編建築藝術雜誌《Artech》(2010)；「大石館」策展人；威尼斯雙年展少數被邀的個人藝術家。

參與同學 |

成大中文系 / 蔣富璧、蘇玟璇、黃湘涵、吳懿紋
成大電機系 / 紀昕好

主持人 |

翁文嫻（成大中文系副教授，教「現代詩學」、「現代詩創作」等課。2006年主編《現在詩04—行動詩學文件大展》，提出「詩行動」觀念。）



一、如何決定你的行為？思考的要點是什麼？

翁：我們今天要在一個小時之內，與張炳玲對談。在1995到2005年的時候，她是香港《明報》駐外的戰地記者。當時巴爾幹半島發生戰爭，波士尼亞三角地帶，以前的南斯拉夫，她在那邊待了十年？

張：不是，我是用了十年時間，去了很多場重要的戰爭，不是在一個地方待十年。

翁：總之哪兒有嚴重的戰爭，她就非得要去那邊採訪就對了。這種經驗和精神，讓女性的同學聽起來很驚訝，我們怎麼可能像她這樣，越是危險的地方，她就第一個要去到現場？她出過多本不同型態的書，看到這本《Artech》(2010)我終於被她打倒了，因為她出得太好了，這本華人建築的藝術雜誌，我就印象很深。想問現在是不是還有這本雜誌，去查了維基百科，才知道張炳玲是個大名鼎鼎的人物。她就是拍六四天安門事件經典畫面的那個記者，一個人面對坦克車的那張照片。

張：其實其他國家的記者也有這個圖，不單是我。

翁：這張就是從她住的旅館的窗口拍出去的，她還叫別人一起來拍，否則她就是獨家了。她

當時想，我不要一個人佔有這個畫面，就找左右門牌那些外國記者，全塞到她房間一起拍，所以我們看到的，都以為是外國的甚麼法新社、路透社，實際上是她敲門叫他們來拍的，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事件。後來做完這個以後，她還去了上海、廣州、北京、威尼斯四個地方，各地籌建一個「大石館」，提供四個展覽的平台。去年她還去了羅馬的梵諦岡，讀了大半年的拉丁文，跟一些從全世界來的紅衣主教、修士，共同來修習，等於未來的教皇就可能是她的同學。她如何決定她的行為，思考的要點是什麼？像我們，通常只認識父母、親友、鄰居、同事，然後跟這些本來就熟悉的人來往。她如何可以超過這些，去一個很遠的地方，然後決定：當我非得去做這件事的時候，我就去做這個事情？而且是世界性的一個行為，這個是我特別有興趣的地方。我們研究「詩行動」的，覺得她對於女性，能去到一個新的視野的起點，非常有意思，所以特別找了你們一起來對話。

二、幸福的邊界——和七十六億人有關

翁：我就從「幸福」兩個字開始講起，在《Artech》

雜誌的專題報導中，景觀建築、藝術家米丘也有提到這個「幸福生存」的問題，這當然不只是米丘提出來的，我覺得我們所有人都對這個命題有反應。我曾寫過一首詩〈歌喉邊界〉，其中有兩句：「幸福無意義／不可追尋」。「幸福」兩個字對我來說，是愈想愈不大能理解。你說超越理性的一些東西，積極生活就會帶來幸福，現在還是這樣認為嗎？

張：更深刻。

翁：更深刻的含意是什麼？

張：很多人用幸福這兩個字 Happy Existence，就用英文的語氣來說，是很快樂的，但我是一個希臘文 Eudaemonia，而不是用 Happy 這個詞。Eudaemonia 這個詞是說，你的所謂幸福快樂是有責任的。在我做這建築雜誌的過程裡面，土地、建築師去到一個地方，永遠就是加東西到這個地方，但土地是沒有否決權的。蓋一個房子在這裡的時候，你就把一片地都壓住了。我採訪米丘，當他說他要尋找幸福，就反問他：你說的幸福，是幾個人開心蓋個房子，有太陽、清新空氣？有沒有考慮土地的問題？現代人基本上沒有土地，我們只有空間的概念，你家住 30 坪、90 坪，

這是空間的概念。但是，尤其米丘作為一個建築師說要找幸福生存的時候，我要問他，幸福的起點在哪裡？

紀：為什麼要問起點？

張：這個世界如果只有兩個人住一個房子，兩個人很舒服，但這世界有七十六億人還有無數的動植物，世界不只是人類在這裡生存的，我們開始的時候就是思考幸福這個概念。以後找到一個好丈夫，跟他生活在一個美好的房子，那只是七十六億人中的兩個人很幸福，其他人你沒想過，這也是為什麼標題的時候用 Eudaemonia 這個字。希臘人在兩千年前已經有普選了，你就可以想像，這些人想到「幸福」的時候，不是我們的概念，他想的是整個土地、人民的幸福。我覺得幸福一定要有超越性，最起碼要超越自己本身的幸福。你尋找幸福，開始累積財富，再開始保護財富，最後你死在財富裡。但我會想，當你一個人行走在這世界時，不是只有一個人，你和大自然是有很多關係的。

翁：和七十六億人是有關係的，如果忘記這個，你完全不可能得到幸福。張炳玲你是怎麼想到這個的呢？同學們平常會這樣想嗎？

紀：我覺得不會。

翁：可能連七個人都不會想到。

蔣：我有時候做資源回收的時候，會想到要為世界環保盡一份心力。或者為這個環境著想，我要少開一點冷氣。

吳：我也會想這餐不要拿衛生筷，可是工廠又已經生產了，而且我不拿的話，工人會不會沒工作呢？

翁：同學們要不要也講一下你們所想的幸福？

黃：我覺得幸福是相對的，有一個人幸福，就有一個人不幸福。我們得到幸福的同時，就剝奪了另一個人的幸福。像剛剛學姊提到說，我們想要吹冷氣，可以感覺幸福，但同時環境正在變化。像衛生筷的問題，我們如果不拿，工人可能就沒工作了，所以我們幸福時，好像別人的幸福就被剝奪了。又或者我現在想出去念書，可是家人生病了，我可能就剝奪掉家人對我渴望的幸福。如果留下來照顧他，這就剝奪掉我的幸福，我覺得幸福和不幸福往往是一體兩面的東西。這又回到剛剛說幸福快樂是有責任的，這個責任可能就是一種不幸福吧！

三、幸福與舒服的分別

張：我覺得幸福不等於舒服，是心理有一個很美

好的東西，有能力出現的東西。譬如我追求念書，但是剝奪掉我與家人的時間，我覺得那跟幸福沒有關係，那只是現實裏面時間的問題，邏輯的問題。

譬如我去波士尼亞，我眼巴巴看著一條村子全部被種族清洗，男生全被殺，女人全被強姦，等她們懷孕了，就有敵人的血統。我去到那個地方，寫了一篇文章出來，我不會考慮看的人幸福感會不會被剝奪，因為我不覺得，閉著不看這個世界就等於幸福。所以幸福對我來說，不是有了 A 就不能有 B，反而我的讀者他看了文章會更明白自己，不是獨善其身或者比誰慘，我是希望能喚醒人的良知，讓世界不再有戰爭。幸福是自己有能力被表現出來的，我是有能力的，有一種動能去努力，為了七十六億人的幸福努力。

像 2000 年的時候，我去北極追一個油田總裁，他做了一個人工的島，把北極的油運到阿拉斯加，我們就一直追他，找他做訪問什麼的。因為大自然一動，那個油田一爆，北極海裡可能都是油，是很危險的，也可能把北極熊什麼的都殺了。另外，我覺得我在工作中是幸福的，能參與在這個世界，代表著背後的讀者來到這地方做採訪，看到世界的

現象，這是我覺得很幸福的。

翁：所以你覺得是幸福的？是幸福不是舒服。

蔣：就我目前而言幸福的狀態，是覺得自己正在進步、前進。這有一個過程，當你發現你關心很多事情，可最終只能用你的方式去努力。我做的是，讓我自己有能力，或許也不能改變什麼，但至少你參與在裡面。因為有些東西，如果沒有這方面的知識或理解力，你是連參與都沒辦法的，完全被排除在外的。

紀：可能我比較小，覺得幸福就是自己身邊的人過得好，這樣就不錯了。當然還是會想到世界上其他的人或東西和我的關係，我只能盡量去做，這樣就達到我想像的幸福了。

蘇：我想問剛剛說的舒服的狀態，譬如家人的問題，張老師您說那是舒服，不是幸福。我就想到電影《一千次晚安》，女主角是戰地記者，要去戰場拍攝，是很危險的工作，炸彈可能就在她旁邊爆炸。家庭因為她的工作，關係變得緊張。她先生就說，每次等她回家的時候，都不知道她是生是死，好幾次都以為她死掉了，這種感覺妳知道嗎？主角的女兒有一次就拿著她的戰地攝影相機對著她一直拍照，然後哭著告訴女主角，這就是她

的感覺。這部電影這一幕讓我印象深刻，戰地攝影師是這個女主角想要做的事情，可是她的人生、她的家庭因此要付出的代價，不知道要怎麼處理。

張：一個是翁老師剛剛說的情感的語言，你家人對你的擔心。但這又回到了每一個人在地球裡有甚麼責任，使命感？我覺得這個比較重要。如果我要去戰地的時候，家人變成拖我後腿的人，大家會很辛苦。所以在感情的語言，我會告訴他們，每個人人生出來都有一個使命感，沒辦法的，我生出來就是要做這件事情，有一個責任要去完成的。可能有些人人生出來就是要做一個媽媽，這是可以的。但每個人都有不同要做的事情，人是平等的，只是分工的問題。

我沒看過這個電影，但你說的讓我想起，我曾經在波士尼亞碰到一個記者，後來CNN訪問她，最後一個畫面讓我很崩潰。記者問她說：妳去過這麼多地方，有沒有被強暴過？隨著畫面慢慢變黑，她回答說：more than once。這很可怕呀，你當記者還要遭遇這些，因為你去到戰爭的地方，這些軍人可能明天打仗就死掉了，所以他會毫無底線的做他喜歡做的事情。所以當我看到這個

訪問的時候，心裡面疼得不得了。所以我反而會反思，為什麼人會犧牲自己，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，可以承受這麼多？所以最後還是回到一個「尊重」的問題，這是倫理道德裡最重要的事情。電影中這個小女孩可以用各種方法表達她的掛念、想念，但如果她的丈夫都拖她後腿的時候，你有沒有尊重她這個人？如果她失去了這個工作，她的生活就變成零了。難道你要她去每天在家洗衣煮飯嗎？整天跟著老公去哪這樣？她的生命可能就變成零了。是不是我們的擔憂要讓一個人變成零呢？我覺得這是更大的要去反思的問題。

四、追尋我的 Identity 靈魂體

翁：確實，這樣就比較不矛盾了，不能讓一個人變成零。說到主體 subject 的事情，你對這個字有反應嗎？你說你會思考個人和七十六億人的關係，還有無數的動物或植物，你永遠都會想到有這麼多切面和你有關？你的使命也和上天和你的聯繫有關嗎？你是這樣思考的嗎？

張：倒不如說我的邏輯是這樣，我是從「大」到「我」，而不是「我」到「大」。如果是從

我開始的時候，我就覺得這個世界非常微小，我不夠一棵樹長得老，樹可以長到幾百幾千年，我也不夠石頭這麼沈默，我還會要說話。所以我很小的時候，就覺得自己非常微小，但是我一方面覺得自己微小，另一方面我一定有一個存在在地球的意義。我不會用主體 subject，我會想我有我的 identity 一個角色、身份，每個人都有，不只是誰的老婆女兒，而是你的靈魂體。但我思考的時候，不是想上帝和我有關，若只是上帝給我的，我覺得是太簡單的思考。我是想靈魂體中，我的 identity，在這當中我會詢問我怎麼生存，我的價值在哪裡？我會這樣思考。

翁：那男性女性就沒有分別了？

張：對我而言沒有，也沒有國家的分別。

翁：我明白了，那你對藍圖的想法，你有一個時間的距離，在這距離中你可能會完成甚麼事情，有這種構想的思維狀態，你能說一下嗎？

張：我覺得這和我思考的邏輯有關係，邏輯對我來說很重要。未來對我來說沒有意義，我是用時間來確認，一個大家共通的語言。譬如我昨天問台南「浣莎」藝術中心的老闆，五年之後會怎樣？因為我覺得對一個空間

來說，五年應該是一個階段，三兩年都太短了，可能五年他就會有一個藍圖出來，最後你想完成什麼。對我來講，時間很可怕，叫不回來了，生命的時間一直在燃燒，現在我們在講話，時間也一直在過去。不管你是多聰明的人，都不可能把時間拉回來，所以我對時間的敏感度很強。

五、「公平正義」要冒著危難去實踐

翁：可以和我們說一下關於「公平正義」這個詞語？她在大陸為了做《Artech》這個雜誌，和那些人生活了兩年，策劃「大石館」的時候也是，一共在大陸住了四年。其實很辛苦，會有人來調查她，像間諜一樣追蹤她，或許等等就被關起來，是一種會被打擾的恐懼。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？她說是想讓他們知道，世界上的知識是可以達到這樣的可能性，她認為，知識對這個世界的公平是很重要的。大陸人沒有接受這個領域的知識的機會，沒有窗口，所以她要進去做這個窗口，我才真正明白她說的「公平」是甚麼。

張：我覺得一個人沒有知識的時候，他不會有可能性，等於如果你的生命裡只有空心菜，沒有高麗菜，你永遠就只炒空心菜。

翁：這就是我以前跟學生們講的，詩人羅智成

說：「在 3 還沒出現之前 / 我們只有 1 跟 2 可以選擇」，就是講這個。

張：所以我覺得知識很重要。當你知道有空心菜高麗菜芥藍等等，就有了有更多可能性，我很想打開不同的可能性，在這個世界裡。我覺得不單是打開它，還有最重要的是把可能性發生。

翁：法國哲學家朱利安 (François Jullien) 在他新的哲學概念裡也有說，他要把可能性發生。

張：對，所以我說要把可能性打開。我常說人生如果只有一條路，就是死路一條，但如果有可能性，就可以拐很多彎，看到不同的風景，有不同的人生，我覺得那是比較豐富的人生。我在當大石館館長時也是，我覺得生命裡有可能性，你會打破很多困難。我在大陸時，面對很多問題，但我覺得是有可能衝破它的，我相信有可能性，我可能感動一個公安，讓他別來煩我。看見我的東西，應該很感動吧？就別來煩我了。可能我是香港人，比較天真。當我相信可能性時，我就有能力去衝破那些困難。當我覺得很多東西是不可能的，我就沒有能力去衝破那些困難。我受聘在威尼斯做藝術時，和老闆開了一個條件，我要在威尼斯開一個館，當時想，如果要我張炳玲來做一個空間藝術時，我要

做啥？我要放畫或者全部都放花？或是種一千種花，讓每一個人進去都很開心？我開始思考藝術品是什麼。我後來就用新的概念來做空間，做一個藝術文化平臺。我要讓東西在裡面可能發生，真正好的藝術品可以打開一個人的靈魂，那才是好的藝術品。它會把人某一個閉了的地方打開來。

像《海底斑斕》這個作品是一個美國的藝術家虞蘭因，她很喜歡潛水，用彩墨的方法畫出海底的世界。她說：「我不是每天去抗議保護海洋的人，但我是藝術家，我把海洋的美畫出來，這樣也許人們對海洋不會太殘忍，不會去污染它。」她的話蠻打動我的，我覺得一個藝術家這麼想挺好的。

我就找了幾批人來對話，第一個是西非爾(Sylvia Earle, 1935-)，美國白宮海洋顧問委員會的主席，她是目前全世界女生潛水紀錄最長的保持人，有七千個小時在海底，國家地理雜誌許多海底圖片都是她拍的，她從美國飛來廣州。我還找了一個國際自然基金會，他們用了一億的美金去改善中國長江的某一段水源，真的是用錢來改善那個地方。另一個是改善長江水源的人，中國社科院的，用二十年關注南中國海的珊瑚，基本上珊瑚全死掉了，因為許多船污染等等。我們還找

了綠色和平的這些人，還有藝術家。最後我做了一個五百人的對話，我認為透過藝術的展示之外，藝術家要有一些想法拿出來，我覺得我當一個策展人，我要把那個想法讓來看展的人有更多思考，才是重要的地方。而不是來看展的人開心或不開心，那跟我沒關係的。我覺得透過這個展覽，可以發生各種可能性，你想五百人都聽到這些事件，聽到南中國海這些珊瑚都死了，會怎麼樣？那個中國社科院的女生說到後來都哭了，因為她真的很心疼。那五百人我不知道他們聽了之後會怎麼想，不知道能改變他們多少，那不是我能控制的東西，但是打開了那個可能性，他們可以開始思考那個問題，後續也許有更多可能性了，可能他們會去參加綠色和平等等，積極去做選擇。我覺得做一個空間，就是幫人打開可能性。很多人覺得空間只是放一個畫就可以了，我覺得我要讓同行的人知道，空間不只是放東西展示，是可以發生很多對話和互動的，這是我當時做了兩年的事情。